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

毛 强

摘 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和推进,邓小平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思考逐渐深入。在他的领导下,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围绕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措施新要求,成为我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纵观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这份重要文献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堪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关键词 邓小平 十二届三中全会 经济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者毛强,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编辑(北京 100091)。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①,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方针政策,启动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3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份重要文献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决定》的起草制定和贯彻实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称《决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稿”,也给予这份重要文献准确的历史定位。

一、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认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②但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常常出现割裂或肢解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个突出体现,就是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论断,

简单地认为计划、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代名词,特别是将国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要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汲取“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正视当时俄国小农占大多数的实际情况,实行“新经济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斯大林建立的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使苏联迅速跻身于工业强国的行列,因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效仿的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在各方面建设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以效仿斯大林模式为标准,出现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管理体制高度集中、官僚主义严重等问题。1956年4月4日,毛泽东针对这些弊端,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③

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取得了良好开端。例如，毛泽东基于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方针，包括：调整经济计划，解决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完善经济体制，理顺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④在中国八大上，陈云就经济体制问题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观点。“三个主体”是：“国家与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个补充”是“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个体经营”“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⑤然而，“左”的错误在1957年后逐渐发展，“大跃进”和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给经济建设带来了惨痛后果。“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管理体制僵化，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导致国民经济建设的困难日益严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成为人们的共识。1978年9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经济工作的三个转变：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鲜明地提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⑥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着重谈了放权问题，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

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⑦他还告诫全党：“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⑧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随后，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成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取得连年增产，农产品日渐丰富，农民收入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如实行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发展多种经济形式，也见到成效。但相较于农村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总体上仍然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条块分割、企业效率低下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农村改革的发展，也迫切要求城市更好满足农村对农业生产资料、工业日用品和科技、资金等方面不断增长的需求。

如何深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而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979年9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技术引进、经济理论与方法问题四个小组，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79年12月起草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参加《决定》起草工作的谢明干回忆说，邓小平得知“有这么一个素材性的稿子就说，可以‘披头散发’和大家见面征求意见嘛。于是这个稿子就拿到全国计划会议上议论，大家认为其基本思路对头，但方案还不成熟，因此当时未定下来。”^⑨1980年5月，国务院为加强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与部署，又专门成立了体制改革办公室，负责起草《关于调整时期的改革意见》，于1982年2月定稿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这两个经济体制改革

的方案，都强调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扩大企业自主权等政策，促进了当时的改革，也为后来起草《决定》作了铺垫。

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关键是破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初，邓小平就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深刻思考。1979年11月26日，他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明确表示：“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⑩1982年7月26日，他在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⑪

1982年9月，十二大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企业的关系；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坚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在所有制结构上，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在调节体系上，规定“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经过一番思考之后，邓小平决定将城市改革作为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据参加《决定》起草工作的高尚全回忆，“全会召开前，对于会议究竟要以什么内容为主，邓小平说最理想的是要搞一个改革的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不能搞一个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他说就搞这个文件，别的不搞了。”^⑫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从1984年5月开始组织力量起草文件。

1984年6月23日，邓小平向全党提出：“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在内。总之，我们内部要继续改革。”^⑬10月2日，他对参加国庆活动的杨振宁、李政道等人说：即将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主题是城市改革。“如果说开拓新局面是从农业开始，这次则是全面改革，包括工业、商业、科技、教育等，范围很广。改革是很迫切的。因为农村政策见效，农民好起来了，如果城市不进行改革，就会妨碍农村继续前进，城市也满足不了占我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需要。城市改革要有更大的勇气。农村改革说明，城市改革不但必要，而且相信会成功。”^⑭10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的全体代表时进一步指出，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由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可能会出些差错。但这影响不了大局……十二届三中全会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写上很重要的一笔”。^⑮

确如邓小平所料，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并被实践证明在历史上写下重要一笔。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

社会主义改革

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据此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政策。其中，最富有创造性的论断，就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决定》鲜明地指出，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并明确指出：城市是工业生产、建设和商品流通的主要的直接承担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城市企业是否具有强大的活力，对于中国经济的全局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对于20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关键问题。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在所有制的结构上，《决定》指出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要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要为集体、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创造条件，并给予法律保护。这就突破了过去“一大二公”、公有程度越高越好的框框。

此外，在政企关系、经济结构、价格体系等问题上，《决定》都提出了明确的方针政策。在政企关系上，强调“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反对政企不分，要求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进行改革，各级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在经济结构上，反对条块分割，要求按照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在价格体系上，要求按照等价交换的要求和供求关系的变化，调整不合理的比价。

《决定》通过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那么，《决定》何以成功呢？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深刻指出，《决定》好就好在“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⑥尽管他谦虚地表示，“现在外国报刊都是讲我在里边起了什么作用。有作用，主意出了一点，但主要的工作，繁重的事情，是别的同志做的。”《决定》“这个文件，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不要宣扬我起的作用有什么特别了不起”。^⑦但《决定》的基本思想，充分贯彻了邓小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讲话精神。

实际上，在《决定》的起草中，邓小平也给予了重要指示。1984年10月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第七稿的电话意见：文件看过了，写得很好，政治局会议我就不参加了。^⑧由此可见，邓小平对文件起草工作比较满意。随后，邓小平对《决定》送审的第八稿批示“同意”。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时指出：十二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会。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⑨

三、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

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深刻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⑩遵循这个指导思想，《决定》

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强调必须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从而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在邓小平看来，《决定》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他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是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指出生产力标准的重要性：“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④

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就针对“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问题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⑤1964年1月11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衡量我们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我们能不能发展生产力，能不能比较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⑥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对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生产力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入。1980年5月5日，邓小平会见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在向客人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说道：“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⑦1982年4月3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这几年实行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有成绩的。我们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寻找新办法、制定新制度，使整个国家的各种体制越来越完善，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⑧

基于上述认识，《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时，即席发言指出，“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有这么一个评价。”^⑨10月22日，邓小平出席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时再次高度评价《决定》“写出了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⑩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也高兴地说：“去年，中央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世界都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⑪

《决定》的通过，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历史性作用。它的“一些重要的改革理论特别是改革的方法论思想，至今仍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⑫。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这个“初稿”的基本观点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不足之处也得到了补充或修正。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

题的决定》……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并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经济建设的实践是不断前进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不能停滞的，指导经济实践和体制改革的理论也要不断前进。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引领中国经济开始了一场意义重大的深刻变革。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①，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升华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坚持、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②。

注释：

①《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7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4页。

③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3、43页。

⑤《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⑥⑦⑧⑩⑫《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145、150、236、313-314页。

⑨谢明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诞生前后（一）》，《百年潮》2009年第11期。

⑪⑬⑮⑯⑰⑲⑳㉑㉒㉓《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5、78、91、83、81-82、2、373、313-314、83、108、83、108页。

⑭高尚全：《参加起草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决定》，《百年潮》2009年第2期。

⑮⑯⑳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97、1003、810、1006页。

㉒《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㉓《邓小平文集（1949—1974年）》下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4页。

㉔卫兴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文献及其理论创新》，《党政干部学刊》2004年第12期。

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㉖闻言：《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奋力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学习〈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人民日报》2017年6月9日。

[责任编辑：张源]